

从军医到税官

王功良

一

我曾经是一名军医。

前些天,几家朋友聚餐迎新年时,女战友孙丹感叹说,你怎么舍得啊?军医都不干了。

其实孙丹有所不知,当军医,实在是非我所愿。

1984年考军校时,原济南军区把成绩排在前列的80多名考生都录取到军区军医学校军医班,不管考生本人志愿填的是哪里,一刀切,绝对是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。

济南西郊段店腊山之东,便是军区军医学校的校址,腊山西边是军区陆军学校。一文一武,腊山脚下汇聚了军区两座最高学府,战友们戏称这里是原济南军区的“北大清华”。

到了军校才知道,好多战友都没有报考医疗卫生专业。汪东红、方勇、王俊、程传义等七名战友都来自野战部队,同我一样,他们的梦想也是金戈铁马、驰骋疆场,“男儿何不带吴钩,收取关山五十州。”拿个听诊器,穿个白大褂,看看舌苔摸摸脉搏,实在不是我们的梦想和愿望。

军区军医学校对军医的培养方向是基层卫生防疫,就是负责连队的“除四害”,定期喷洒灭鼠药、督促伙房安装防蝇网、指导炊事员搞好饮食卫生、防止连队食物中毒等。这些工作属于说起来重要,干起来次要。我在军校第二年时,军医学校就改换了名称,叫做军区卫生学校,应该说这才有点名副其实。

尽管如此,基础医学知识还是要开课讲授的。细胞、器官、组织、大肠杆菌、革兰氏染色……冰冷的医学知识,灌得我整天脑子嗡嗡的,油盐不进,苦不堪言。

女学员们倒是莺歌燕舞的,从来没听说哪个女学员有厌学情绪,个个激情满满。

对前途的淡淡忧伤,如乌云般笼罩在我们几个同病相怜的战友心里。空有凌云志,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,相同的境遇,使得我们八个战友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,或者课余时间,越过腊山去找陆军学校的学员打篮球、踢足球……校内道路两旁,是两排密密匝匝的法国梧桐,我们把帽檐压在右边半条剑眉上,走起路来宽大的军裤哗啦作响,战友们戏称我们是“八大金刚”。我们八个可是队里的文体骨干,王俊和程传义是篮球健将,打得一手好篮球;汪东红是文艺青年,说快板、讲故事惟妙惟肖;方勇是摄影爱好者,常在军区《前卫报》上刊登新闻照片;而我则办起了油印小报,既写报道又划版,煞有介事……说起这段经历,孙丹曾打趣说,都是些有故事的人嘛。

虽然课余时间很丰富,但是仍掩饰不住心中的苦恼,我甚至想到了退学,幸好班长方勇阻止了我冲动的想法。

百无聊赖时,我便弹起吉他纾解心中烦闷,“未成曲调先有情”。那时,男女学员宿舍都在同一层楼,女学员宿舍靠近走廊最里边,我们班的宿舍门正对着走廊洗漱室。晚上熄灯前,四班马红燕和几个女学员洗漱时,听着我在弹吉

他,笑呵呵地挖苦说:“王功良整天在弹什么啊?砰砰砰的,弹棉花吗?”

都说这山望着那山高。我们羡慕陆军学校的学员,将来可以指挥千军万马,殊不知他们也在羡慕我们。卫生学校女学员占到80%以上,到军区礼堂参加集会活动时,陆军学校的学员们,齐刷刷地向卫生学校的队伍行注目礼,眼里闪烁着羡慕的光芒。

有一次,我在军区《前卫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《也说王婆卖瓜》。恰好是周末,我和张秋燕等几个老乡,在区队长陈丽萍的宿舍里摆上了几瓶鱼罐头、梨罐头以及熟食之类,说是庆祝文章发表。陈丽萍是烟台市芝罘区人,长我几岁。她苦口婆心地开导我,让我向女学员们学习,向张秋燕学习。“咱们都是军人,军人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你已经进了军校又不想学医,成什么样子嘛……”“是部队培养了你,学习一门专业技术多好,可你却挑三拣四,还想退学?回家你就有前途了?”陈丽萍说起话来,军人式的嘎嘣脆。在军校期间,我不仅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,还得到了她很多的帮助,至今回想起来,心里依然感恩不已。

时间过得很快,转眼就到了实习前的教学阶段。《外科学》授课以后,根据课程要求,需要进行肝脏血管手术教学演练,这是一节重点课程。每个班分配一只兔子,由一名学员主刀,其他学员围在手术台旁观摩。兔子被麻醉以后,静静地仰卧在小型手术台上。见其他同学都没有反应,我自告奋勇申请主刀肝脏手术。指导老师是个女的,不到四十岁的样子,戴副眼镜,看上去文静内敛,说话声音柔柔的。手术过程已经记不大清楚了,只记得我笨手笨脚地将兔子腹部切口缝合好以后,指导老师深深地吁了一口气,柔柔地说:“看你做手术,紧张得我浑身是汗。”提起这段往事,孙丹笑着说,看样子你真不是个理工男。

随后发生的一件事,把我学医的信心彻底摧毁,并在心底留下极大的阴影。

毕业前,我们有半年时间在部队医院实习,每个学员根据排岗在各科室轮转。那一次,我在妇产科轮转实习。有一天晚上值夜班,处理完病历后,我在医生办公室和护士一起搓棉签、叠敷料。门诊转来一名孕妇,好多亲属陪着,神色匆匆地来到妇产科。这名孕妇面容娇美,气质端庄,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。她十分平静地看了我一眼,没有一丝紧张,目光里充满了信任。值班医生经过产前检查后,将产妇推进了产房。不大一会儿,科主任和副主任都赶到了产房。后来得知,孕妇是一位领导的儿媳。

没想到,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意外,因故错过了剖腹产的最佳时机,不得已向孕妇亲属提出了选择方案,“保大人还是保孩子?”亲属选择了保大人,一个婴儿就这样夭折了……眼睁睁看着一个小生命消失,我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动。

毕业前夕,军区政治部想从学校选调一名干事,他们派人来学校考察。由于我在报纸上发表过多篇文章,又是党员,区队长陈丽萍极力推荐了我,但最



作者(右)和战友在学校图书馆前合影

终也不了了之。

二

顺理成章,1987年夏天,我被分配到昌潍平原的荆山驻军,成了一名卫生队军医。

有一年冬天,我作为随队军医去湖北武汉征兵。武汉名胜古迹很多,但是部队也有纪律,不允许借征兵之机游山玩水,而且当时忙于走访兵员,也顾不上外出游览。于是,我就写了一篇稿子《无暇领略风光美,一心只征合格兵》,报道接兵部队认真履行职责的事迹,在当地武装部盖个章后,就寄给了《解放军报》,没过几天就在二版显著位置刊登了。后来,卫生队队长刘贺林拍着肩膀对我说,小伙子,我看你行。

在小洛顶农场期间,空闲时间比较多,我就用来读书,或者写杂文、评论、散文。干部科张晔科长和孙亚松干事注意到了我。一年多以后,我被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,新的人生之路开始扬帆起航。

三

本以为我从此就与卫生医疗行业再也没有瓜葛了,没想到依然是扯也扯不断。

28年前的那个夏天,我从师政治部转业到地方。等待安置期间,市人事局军转办需要几名转业军人去帮忙,传递一下档案、制作打印一下统计表、接听一下电话,我和祁新云等四名转业军人来到了军转办。分配前,隐约听说我的去向是市卫生局,脑袋顿时嗡地一下就大了,连忙去军转办陈主任办公室汇报思想。其实陈主任也是从全局考虑,同时也是为我好。我有军医经历,有政治部经历,去卫生局政工科锻炼几年,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。可是我对卫生医疗行业已经产生了“免疫力”,好不容易抽身出来,怎能再去重操旧业?我情真意切地一番痛说,最终调整了分配方向,总算是解脱了。

说起来,医疗卫生是个神圣而光荣的职业,“救死扶伤,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”。医护工作者更是倍受社会尊敬,只能说这个职业不适合我,我不喜欢。

我有很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战友,他们刻苦努力,勤奋钻研,最后颇有成就。曲明是我的学长,在学习上素有“拼命三郎”之美誉,从军医学校毕业以后,他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,始终像一名冲锋的战士。后来,他成长为军队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,享受国务院特殊

津贴,并创建了烟台昆仑山医院。有如此成就者,在军医学校的校史上,恐怕也是寥若晨星。

后来我到了国税局,被分配在三分局办公室。李京义主任也是转业军人,朴实厚道,对人热情,特别关心和支持转业干部的工作。我如鱼得水,很快成了一名合格的税官。在转业后第一个“全国税法宣传月”中,李主任带领我们设计方案、展开项目、广场宣传、协调媒体、报送新闻稿……我撰写的税法宣传稿件刊登在了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税务报》上,当月在地级和省级报刊上发表了36篇稿件,被省国税局评为税法宣传月先进个人,三分局办公室被市局评为先进单位。那时,基国瑞先生是《烟台晚报》的总编辑,为策划税收宣传月活动,他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,并开办了《讲故事学税法》专栏,每天讲一个小故事,连载了一个月。去年,我和他说起这段往事,称赞他视野开阔眼界高,好事做了一火车,他却笑称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了。

当年军校的“八大金刚”,最终都改了行。方勇在央视军事文化频道工作,王俊去了省公安厅任经侦支队长,汪东红改行到了省交通厅……大家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,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我觉得,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军校这几位战友的经历,让我想起了著名作家余华。高考落榜后,余华进入卫生院当了五年的牙科医生,看了数以万计张开的嘴巴。“我感到无聊之极,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,就是在嘴巴里。”后来,余华对文化馆的工作心生向往。他决心放弃牙医这个职业,要像风一样,追寻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最终,他写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——《活着》。

是的,活着的价值,不过是在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。心生欢喜,无论从事什么行业,只要走正道,必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。

至于我,改行几十年来,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,但也……还算可以吧。



作者本人